

明末清初诗解研究

郑子运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MingMo QingChu

ShiJie YanJiu



明末清初诗解研究

郑子运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MingMo QingChu

ShiJie YanJiu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末清初诗解研究/郑子运著. —南京:凤凰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7-80729-560-0

I. 明… II. 郑… III. 古典诗歌—文学研究—中国—明
清时代 IV. 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6702 号

书 名 明末清初诗解研究

著 者 郑子运

责任编辑 韩凤冉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省句容市排印厂

句容市春城镇南 邮编:212404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214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9-560-0

定 价 24.00 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511—87871135)

序

徐有富

龙榆生在《研究词学之商榷》一文中说过：“前辈治学，每多忽略时代环境关系，所下评论，率为抽象之辞，无具体之剖析，往往令人迷离徜恍，莫知所归。此中国批评学者之通病。”季羨林在《我的学术总结》一文中，还从思维模式的差异上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分析，指出：“我们传统的文艺理论，特别是所使用的‘话语’，其基础是我在上面提到的综合的思维模式，与植根于分析的思维模式的西方文艺理论不同。我们对艺术作品，包括绘画、书法、诗文等等，不像西方文艺理论那样，把作品拿来肌擘理分，割成小块块，然后用分析的‘话语’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比如说，庾信的诗被综合为‘清新’二字，鲍照的诗则是‘俊逸’二字。杜甫的诗是‘沉郁顿挫’，李白的诗是‘飘逸豪放’。其余的诗人以此类推。”但是，如果我们读了郑子运的《明末清初诗解研究》，也许会改变这一看法。

郑子运对明末清初的诗解专书进行了调查，有数十种之多，至今尚存二十多种。书名中含“解”字的就有廖文炳的《唐诗鼓吹注解大全》、唐汝询的《唐诗解》、唐汝谔的《古诗解》、叶羲昂的《古诗直解》《唐诗直解》、曾益的《李贺诗解》、朱瀚李燧的《杜诗解意七言律》、顾宸的《辟疆园杜诗注解》、金圣叹的《杜诗解》《古诗解》、顾施祯的《杜工部七言律诗疏解》、李文烨的《杜律通解》、陆昆曾的《李义山诗解》、浦起龙的《读杜心解》等等。

何谓“解”？金圣叹在写给徐增的信中专门作了解释：“‘解’字为字，出《庄子·养生主》篇，所谓解牛者也。彼唐律诗者有间也，而弟之分之者无厚也。以弟之无厚，入唐律诗之有间，犹牛之谗然其

已解也。”可见这个“解”字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分析。张玉谷还在《古诗赏析》的凡例中对诗解的具体内容作了阐述：“诗后之解，是讲是诗之如何佳妙，俾读者识步趋也。摘句空赞，固无当于通体作法；顺文滚解，则其中虚实、顺劣、提掇、照应种种道理，亦何由达出？鄙解必沉潜反覆，实见得是诗因何而作，立定主意，然后逐节批导其却款，务使当时用意深曲、运笔诡变、制局奇横、措辞精警之处，无不显豁呈露而止。”

子运对明末清初诗解著作的形成过程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论述了注释、讲学、诗文评点、诗话、公文批答，以及八股文、诗歌创作流派等诸多因素对诗解形成所产生的影响，都能给人以启发。就以注释对诗解形成的影响而言，作者联系注释史系统地探讨了这个问题。试举一例，浦起龙《读杜心解》发凡谈到：“李善、五臣注《选》，解行于注中。”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者从《文选》注中，将其所引用的沈约注挖掘出来，并且以阮籍的三首《咏怀诗》为例作了分析，指出：“沈约把这三首诗的注放在本文之后，简括了诗意，已经是完全意义上的诗解。”

该书还对明末清初的诗解代表作进行了个案研究。在分析的过程中，作者本着知人论世的原则，对作者的生平事迹进行了深入而详细的考证。如关于《唐诗解》的盲人作者唐汝询，该书就征引了《明诗综》卷七十作者小传、（嘉庆）《松江府志》卷五十五《古今人传》、《明文海》卷四百四陈衍《唐仲言李公起》、张岱《快园道古》卷二《学问部》、张岱《琅嬛文集》卷四《五异人传》。如钱谦益《列朝诗人小传》丁集中《唐瞽者汝询》云：其人“五岁而瞽，父兄抱膝上，授以三百篇及唐诗，无不成诵。旁通经史，能为诸体诗。笺注唐诗，援据博，亦近代一异人也。尝过余山中，酒间诵《子虚》、《上林》诸赋，杜、白诸长篇，铿锵戛玉，琅琅不遗一字。留校杜诗，时有新义，如解沟壑疏放之句云：‘出于向秀赋：嵇志远而疏，吕心放而旷。’亦前人所未及也。”该传记让我们清楚地知道了这位盲人作者的学习与写作情况。有些作者的传记实在找不到，子运也能从别集等各类文献中钩稽出作者的生平事迹。

子运还能从诗歌接受史的角度,对这些著作的学术价值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钱龙惕的《玉溪生诗笺》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在作者看来,“钱龙惕笺释李商隐诗从 1648 年春到仲夏,不足半年,而李商隐诗素称难解,钱龙惕成书竟如此迅速,然翻检《玉溪生诗笺》,所作笺释不过 42 处。这 42 处中……算得上诗解的,不足半数。尽管如此,《玉溪生诗笺》仍然是不能略过的,因为此书是李商隐诗歌接受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这主要指它以史实来解释李商隐的诗歌。作者接着分析道:“雍正、乾隆间,李商隐诗歌的注家喜谈朱鹤龄,绝少提到钱龙惕,难免数典忘祖之讥,因为朱鹤龄实际上接受了钱龙惕的影响。从朱鹤龄到冯浩,无不或多或少沿着钱龙惕开辟的道路前进,进而取得了超过钱龙惕的成就。”

作者在研究中能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并注意论述各家著作的优点、特点和缺点。为此该书普遍采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首先,作者将诗解分成解义性与解艺性两大类,并分别探讨了各自的形成过程。在进行个案分析时,作者也注意在比较中,彰显同类著作的不同特点。试以张性的《杜律演义》与颜廷榘的《杜律意笺》来说,作者具体地比较了两者对相同的两首杜诗所作的不同解析,得出如下结论:“从整体上来看《杜律演义》与《杜律意笺》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前者更接近沈约,力避穿凿;后者更接近五臣,力求言外之意。如《杜律演义》前集解《早秋苦热堆案相仍》云:‘注家以为贺兰进明潜房谄于帝,并及公,故公被逐,此联盖指当是潜愬之人。要之,不必如此拘也。’而《杜律意笺》力求言外之意,却是该书最值得重视的地方,这也是其书以‘意笺’命名的原因。”可见,在比较中更容易将彼此的差异与特点揭示出来。

该书在论述过程中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言必有据,所举例子往往恰到好处,能非常贴切地说明问题。如作者谈到金圣叹与徐增的诗解著作颇受讲学风气影响,“与讲学一样,他们的解说语言接近白话,也喜欢举故事和身边的实例为证”。他们的诗解作品可视为讲学的副产品。为此还专门引用廖燕《金圣叹先生传》中的一段话,称金圣叹“于所居贯华堂设高座,召徒讲经,经名《圣自覚三昧》。稿本

自携自阅,秘不示人。每升座开讲,声音宏亮,顾盼伟然。凡一切经史子集,笺疏训诂,与夫释道内外诸典,以及稗官野史,九彝八蛮之所记载,无不供其齿颊,纵横颠倒,一以贯之,毫无剩义。座下缙白四众,顶礼膜拜,叹未曾有。先生则抚掌自豪,虽向时讲学者闻之攒眉浩叹,不顾也。”这段文字不仅可作为作者立论之依据,而且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金圣叹诗解著作之特点。注意用统计数据说明问题,也是本文的一个特点,为了说明唐汝谔与竟陵派之间的关系,作者特地作了引文统计分析:“《古诗解》提到钟惺十四次,提到谭元春两次,而七子中只提到王世贞一人,只有四次。仅从这一点来看,唐汝谔已逐渐由七子向竟陵倾斜。”此外,作者还将《古诗解》化用《古诗归》的地方一一罗列了出来,共有十九处之多。有了这些统计数据,唐汝谔的《古诗解》受到钟惺、谭元春《古诗归》的影响也就不言而喻了。

诗歌接受史是个迷人的领域,该书为我们推开了一扇窗口,使我们看到了许多美丽的景色。如果在这个领域里作更加广泛而深入的探索,一定会见到更加精采的世界。特以此与子运共勉。

2009年4月1日于问津阁

目 录

序	(1)
绪 论	(1)
一、诗解的界定及其数量	(1)
二、诗解盛于明末清初的原因	(6)
三、选题意义	(13)
第一章 诗解的形成	(15)
第一节 解义类诗解的形成	(15)
第二节 解艺类诗解的形成	(33)
第二章 解诗者的生平及其诗解的价值(上)	(50)
第一节 廖文炳《唐诗鼓吹注解大全》	(50)
第二节 唐汝询《唐诗解》	(60)
第三节 颜廷榘《杜律意笺》	(71)
第三章 解诗者的生平及其诗解的价值(下)	(82)
第一节 曾益《李贺诗解》姚文燮《昌谷集注》	(82)
第二节 卢元昌《杜诗阐》吴见思《杜诗论文》	(102)
第三节 钱龙惕《玉溪生诗笺》陆昆曾《李义山诗解》	(117)
第四章 八股文对诗解的渗透	(133)
第一节 概说	(133)
第二节 金圣叹的律诗“分解”探源	(147)

第三节	八股文化的句法、章法	(155)
第四节	八股文其他特点与诗解	(177)
第五章	明清之际的诗坛各派在诗解中的反映	(202)
第一节	七子诗派与诸家诗解	(202)
第二节	竟陵派与唐汝谔《古诗解》	(210)
第三节	钱谦益与诸家诗解	(217)
第六章	诗解的影响	(228)
第一节	现代古典诗歌赏析的源头	(228)
第二节	对话话等著述的影响	(235)
第三节	诗解与常州词派	(243)
主要参考文献		(252)

绪 论

一、诗解的界定及其数量

诗解,作为一种诗歌接受方式,早在宋末元初就出现了,但作为一个词,直到清代雍正年间才出现,王尧衢在《古唐诗合解》的凡例中说:“诗解,唐诗居多,其详略不等,古诗解不多见。”^①而此前唐汝询的《唐诗解》、唐汝谔的《古诗解》、曾益的《李贺诗解》及金圣叹的《杜诗解》等书虽然书名中都有“诗解”两字,但都是“诗”先分别与“唐”、“古”、“李贺”及“杜”构成一个词或短语,所构成的词或短语再与后面的“解”构成短语,“诗解”还没有作为一个词使用。金圣叹的《杜诗解》完全是“解”,没有“注”,而其余三书实际上包括“注”和“解”两部分,表明三书的作者实际上也都知道“注”与“解”有区别,但都以“解”命名,当是出于对“解”的重视。本文要讨论的“诗解”,是指整体把握诗作并将诗的语言转化为散体语或分析诗的艺术特点的成段文字,而不是摘句或笼统地进行只言片语的评点。这样的“解”是不包括“注”的,对于这样的“解”的特点、类型、所占的地位等,一直到浦起龙才有比较全面而明确的看法。浦起龙《读杜心解》发凡云:

注与解体各不同:注者其事辞,解者其神吻也。神吻由事

^① 王尧衢《古唐诗合解》,张熙瑾 2004 年据文成堂残本影印。

辞而出，事辞以神吻为准。故体宜勿混，而用贵相顾。

《骚》、汉、邶中、江左诸诗，代各有注。李善、五臣注《选》，解行于注中。降自唐初以后，诗注本渐少，大都所谓流连景光，陶写性灵之什，不注可也。惟少陵、义山两家诗，非注弗显，注本亦独多。然义山诗可注不可解，少陵诗不可无注，并不可无解。

虞山持论见于《鼓吹》者，尝言郝本专取注事，犹得注家之遗，颇以廖解为多事。而其笺杜，则解义间缀篇末。至朱氏本亦错见于节间，是仍不废解说矣。此外则有若《演义》、《本义》、《博议》、《愚得》、《会粹》、《胥抄》、《说诗》、《论文》、《集注》、《详注》、《杜通》、《杜臆》、《杜阐》、《杜解》、《杜释》、《律注》、《律笺》、《律解》等书，又青门邵氏、旅农俞氏诸评本，及唐氏《唐诗解》、顾氏《日知录》、沈氏《别裁集》所论载，不下数十种；句细字绎，解乃繁然竞起焉。虽然，杜未有解，杜自不亡；杜未有解，解犹可不作。吾尝谓杜之祸一烈于宋人之注，再烈于近世之解。《心解》之所为，不得已于作也。

解之为道，先篇义，次节义，次语义。语失而节紊，节紊而篇晦；紊斯舛，晦斯叛矣。而说者每喜摘一句、两句，甚或一两字，别出新论。不顾篇幅宗主如何归宿，上下文势如何连缀。此最害事，凡是必痛削之^①。

与浦起龙同时的陆昆曾也认为“解”与“注”不同，他在《李义山诗解》凡例中说：“诗既引用故实，有故实不明本句之意即不出者，又宜先引故实，后解诗意。集中凡引证处，皆诠释处，与注释不同，非自乱其例也。”^②陆昆曾所言还较简单，他实际上是将“注”融会在“解”中，真正第一次在理论上明确把“注”与“解”区分开来并论述“注”与“解”的关系的，还是当推浦起龙。唐汝询《唐诗解》的“解”据其凡例

① 浦起龙《读杜心解》，中华书局1961年，第5—7页。

② 陆昆曾《李义山诗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

是包括“注”的，吴见思《杜诗论文》每卷卷首标明为“注”，意识尚不分明。谢枋得《注解章泉涧泉二先生唐诗选》虽然标明“注解”两字，但解说时并没有“注”、“解”的区分。廖文炳《唐诗鼓吹注解大全》形式上有了“注”、“解”的区分，但序言毫不言及“注”、“解”的区别。浦起龙指出“注”与“解”的区别在于前者为事辞，后者为神吻。浦起龙的这一区分，解决了自李善注《文选》以来“释事忘义”的争端。而且，浦起龙提出的原则“体宜勿混，而用贵相顾”，能反映当时占多数的实际情况。

浦起龙以为“李善、五臣注《选》，解行于注中”。从浦起龙的角度看，是可以这样认为的；然从李善等人的角度看，并不存在“注”与“解”的区别，只是称呼不同罢了。浦起龙以为只有杜甫、李商隐的诗必须有注，但杜诗又必须有解，李商隐诗不可解。若以为李商隐诗不可解，只是一家之言，在浦起龙的时代，李商隐诗的注解正开始走向繁荣，至乾隆年间，冯浩出，集李商隐诗注解之大成。而且，浦起龙漏掉了不比李商隐诗容易注解的李贺诗，也是不应该的。

浦起龙接下来为“解”作了辩护。他先是对钱谦益指责廖文炳为《唐诗鼓吹》作解为多事，而自己注杜诗却不废解说，表示了不满，但实际上，钱谦益不曾批评廖文炳的“解”，浦起龙误记。浦起龙接着还列举了大量包含有“解”的著作，甚至包括顾炎武的《日知录》，《日知录》当然不是诗解著作，浦起龙列举出来，只是为了提高“解”的地位，或者壮大声势。钱谦益、朱鹤龄、仇兆鳌等人所作的杜诗注，也不能算作诗解著作，因为它们是以“注”为主，如果这类著作也算诗解，几乎任何一本诗歌注本都要算作诗解了，诗解也就失去了独立存在的意义。本文要讨论的诗解是指有“解”无“注”或“注”的比重不超过“解”的著作。

浦起龙提出作解要“先篇义，次节义，次语义”，从《读杜心解》的解说来看，浦起龙并不是机械地按照篇义、节义、语义的顺序解说，

只是提倡从整体上把握，反对断章取义或东一句、西一句的评说。这样，浦起龙基本上把诗解与诗歌评点区别开了。诗歌评点往往是只言片语或东一句、西一句，与诗解有形式上的差别。

诗解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重解义(解意)，“解义”一词取自陆贽典《唐诗鼓吹注解题词》所说的“廖君之解义”。“解义”一词并非陆贽典独创，而是当时比较通行的称谓，如李光地为《离骚》、《参同契》和《阴符经》所作的注解，康熙五十八年(1719)清谨轩刻本题作“李文贞公解义三种”。浦起龙以为钱谦益笺注杜诗也“解义间缀篇末”。解义有详有略，详是阐释，略是概括大义，如浦起龙所列举的廖文炳《唐诗鼓吹注解大全》、唐汝询《唐诗解》就是。另一种是重解艺，即重视作品的艺术特色，如浦起龙列举的金圣叹的《杜诗解》、吴见思的《杜诗论文》。当然，诗解也可以解义与解艺并重，如浦起龙自己的《读杜心解》。诗解中的解与注的区分，往往在形式上表现很明显，为直观起见，现引唐汝询《唐诗解》卷四十三之刘长卿《送耿拾遗归上都》为例：

若为天畔独归秦，对水看山欲暮春。穷海别离无限路，隔河征战几归人。长安万里传双泪，建德千峰寄一身。想到邮亭愁驻马，不堪西望见风尘。(谢灵运诗)徇禄反穷海。○(一统志)建德县，三国吴置，唐属严州，本朝因之。○(鲍照诗)一身仕关西。○(后汉赵孝传)孝从长安还，饮止邮亭。(广韵)邮，驿也。

此伤乱之诗，意谓秦中方扰，拾遗乃从天畔归之乎？纪其时则暮春也。别穷海而趋秦，路更无限，况隔河征战，归人几何，而可独往耶？我方恋阙，因君之行，不无洒泪，然欲苟全性命，则宁寄此身于建德千峰间耳。想君前路当止邮亭，西望风尘，不堪莫甚，君其勉之。是诗年月无考，观隔河西望等语，必吐蕃之难也，岂代宗幸陕之时乎^①？

《唐诗解》都是先注后解，解与注并列放在本文之后，且解另起一行；

① 唐汝询《唐诗解》，《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齐鲁书社1996年。本文所引提要均为该丛刊所附，不再另外出注。

有的诗解著作也有在解与注之间用“○”隔开的；也有的注夹在本文里面，解单独放在本文之后，这不仅仅是形式问题，这表明解已经从注里独立出来。注在何处无关紧要，解一般都放在本文之后，这就使诗解体与章句体区分开来。本文凡用“诗解”一语，都是作为专有名词使用，主要指明末以后的诗解著作，或者是这些著作对诗所作的解释。

本书论述时期跨度为从明末四朝到清初三朝，具体说，就是自明万历中期、天启、泰昌、崇祯到清顺治、康熙、雍正初，约一百四十余年。以廖文炳《唐诗鼓吹注解大全》为起始，以浦起龙《读杜心解》殿后，中间至少包括唐汝询《唐诗解》、唐汝谔《古诗解》、颜廷榘《杜律意笺》、王嗣奭《杜臆》、胡震亨《李诗通》、《杜诗通》、叶羲昂《古诗直解》、《唐诗直解》、曾益《李贺诗解》、周珽《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张笃行《杜律注例》、朱瀚、李燧《杜诗解意七言律》、顾宸《辟疆园杜诗注解》、金圣叹《杜诗解》、《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古诗解》、徐增《说唐诗》、陈醇儒《书巢笺注杜工部七言律诗》、钱龙惕《玉溪生诗笺》、姚文燮《昌谷集注》、吴见思《杜诗论文》、卢元昌《杜诗阐》、吴淇《六朝选诗定论》、黄生《杜诗说》、陈式《问斋杜意》、汪灏《知本堂读杜》、卢生甫《杜诗说》、胡以梅《唐诗贵珠串释》、沈用济、费锡璜《汉诗说》、赵臣瑗《山满楼笺注唐诗七言律诗》、顾施祯《杜工部七言律诗疏解》、李文炜《杜律通解》、徐德泓、陆鸣皋《李义山诗疏》、陆昆曾《李义山诗解》。浦起龙还提到张远的《杜诗会粹》、潘柽章的《杜诗博议》和卢世淮的《杜诗胥抄》，但《杜诗会粹》采诸家解，不是诗解体例，《杜诗博议》已亡佚，《杜诗胥抄》实际上没有注解，浦起龙误计，都不算在内。另外，王尧衢的《古唐诗合解》虽然受了《唐诗解》、《古诗解》的极大影响，但属于章句体，取消了解的独立性，不计入在内。明末唐元竑《杜诗攷》看似诗解体，实是札记，也不计入在内。需要指出的是诗解体与评点体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如金圣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既题“选批”两字，表明金圣叹自认为是评点，别人也以为是评点，但该书与金圣叹另一著作《杜诗解》体例一

样,都是诗解体,这种两属的情况是存在的。

明末清初的诗解的实际数量肯定比前面所列要多,除了所见有限外,还因为这个时期的诗歌笺释著作也有很多亡佚了,其中就有诗解著作。既然已经亡佚,怎么知道其中包括诗解著作呢?这并非自相矛盾,现仅举一例为证。廖燕《二十七松堂文集》卷十四《金圣叹先生传》说:“先生没,效先生所评书,如长洲毛序始、徐而庵,武进吴见思、许庶庵为最著,至今学者称焉。”^①徐增(号而庵)《说唐诗》、吴见思《杜诗论文》见前;毛宗岗(字序始)所评为《水浒》,不在此列;许之渐(号庶庵)有《槐荣堂奏稿》、《茶马事宜》、《槐荣堂诗文集》、《槐荣堂诗抄》、《拳帷行纪诗》五种著述,唯一有可能仿效金圣叹的只能是《槐荣堂诗抄》,当是诗解著作,惜已亡佚。

二、诗解盛于明末清初的原因

诗解盛于明末清初,明万历以前只有寥寥数种,清雍正中期以后也不多见,其原因是值得探究的。大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明末清初的时代因素。明末社会经济跃上繁荣昌盛的顶峰,人口大量增加,随之带来了文化的繁荣,能著书立说的人自然增多了。如唐汝询耳治,李垕目治,都能著述,尤其是唐汝询,有《唐诗解》、《西阳山人编蓬集》、《姑蔑集》、《汇编唐诗》等著述传世,这正是明末文化繁荣的特有的表现。能著述,本来就表明了士人的身份。唐汝询、李垕都被看作士人,如果他们不能著述,不过是一盲一哑而已,哪里还会被看作士人?同样,清代康熙年间,社会逐渐呈现出承平气象,人口及经济发展水平都超过明朝,文化也繁荣起来,能著书立说的人,比明代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处于两个时期的过渡阶段的

^① 廖燕《廖燕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第 302 页。

明清易代的巨变,在一定程度上既摧残了晚明文化的繁荣局面,同时又产生刺激作用,恢复、继承、分化、蜕变,使得清初文化界更显混乱,反映到承载文化的主体上来,一部分人经过明清易代,仕进无门,或绝意仕途;另一部分人虽然仕清,但人生无常、命如朝露的意识,现存社会制度存亡的不确定感,以及个人在某种强大力量面前的渺小而无可奈何感,都空前加强了,著书立说成为他们一个共同的寄托手段。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自己的士人的身份更加强调,当包括名节、地位、权势、财产、亲朋等能失去的都失去了的时候,唯独斯文是不能坠落的,否则,他们无法成为跨越平民到官员这一广大士人阶层的一员。而且这一身份决定了他们存在的方式,他们不可能也不愿意放弃这个身份躬耕陇亩,即使不得已去经商,他们也认为自己是文化的儒商,与一般的商人不可同日而语。当“立德”、“立功”变得无从谈起,“立言”成为他们强调士人身份最有效的手段,这也是士人身份赋予他们当中不少人内在的冲动。而且保持了士人身份,就有出仕的可能;不能出仕,以士人身份终身亦可。金圣叹属前一种情况,廖燕《金圣叹先生传》认为金圣叹“鼎革后,绝意仕进,更名人瑞,字圣叹。除朋从谈笑外,惟兀坐贯华堂中读书著述为务。”^①廖燕说金圣叹“绝意仕进”,只是饰词。当听到顺治赏识才子书的传闻,金圣叹竟然激动得流下眼泪,还北向叩首,并恭敬地赋诗一首,表现得完全不像绝意仕进的人。卢元昌属于后一种情况,《杜诗阐自序》云:“吾生之忧患多矣,非得一业焉以专攻其中,则世之穷通得丧、身之生老病死皆得挠乱其胸,将夺其所可乐者,而日形其所苦。”又说:“吾生之忧患多矣,藉是以忘其所苦,而得其所乐焉。”^②他在《左传分国纂略》的纂例中说:“左氏圣于文,杜公圣于诗,不揣固陋,愿学未能,纂述之余,极知僭妄。庶几不得志于时之所为也。”^③卢元昌所谓“忧患”、“不得志于时”,主要指经过清初轰动一时

① 廖燕《廖燕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01页。

② 卢元昌《杜诗阐》,《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齐鲁书社1996年。

③ 卢元昌《左传分国纂略》,《四库未收书辑刊》本,北京出版社2000年。

的奏销案被削籍以后,失去进入仕途的机会,只能靠著述为安身立命之处。吴见思入清之前就绝意仕途,他没有诗文流传,如果没有《杜诗论文》等著述,恐怕很难被当作斯文中人物。另外,还有曾益、徐增等人入清都没有出仕,曾益、吴见思生活状况不详,金圣叹、徐增穷困潦倒,但他们都没有寻求其他出路,均以著述为后人所称。曾益尤其值得注意,他甚至未入过学,连那个时代读书人最基本的生员资格都没有。他喜欢作画,但是如果仅限于只能作几幅画,也仅仅只是个画匠,但他显然不满足于此,著有《曾氏世乘》、《左略》、《李贺诗解》、《温飞卿诗集笺注》等书,从而得以进入士人行列。这些士人中的精英,自可开宗立派;无法成为一代宗师的,自可对潮流推波助澜。推波助澜的一种方式 is 整理典籍,如果学识不够注经考史,可以注解诗歌,踵事增华,尽一点绵薄之力,当是力所能及,这一点表现在明末清初的诗解著作多多少少都表现出对某个文学流派的依违。诗解体的注解方式作为后起之秀,易为一部分人所接受,从而使诗解体著作在明末清初达到兴盛阶段。

二是经史注解方式与学者讲学方式的渗透。集部的注解方式都是来自经、史,如果哪部集部著作取得了类似经典的地位,就有可能首先被用注解经、史的方式加以注解。《楚辞》先获得这种地位,先被注解。接着《文选》获得这种地位,也被注解(《文选》之前单篇的赋不考虑在内)。对《文选》中诗歌部分的注解,标志着经、史的注解方式正式渗透到汉魏以下人创作的诗歌领域,为单纯的个人诗集注解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杜甫在众多诗人中脱颖而出,他的诗集首先被注解,而且蔚为大观。诗注逐渐接受其他著述方式如诗话等的影响,逐渐发展出诗解体,而这已经到了宋末元初,发展进程相当缓慢,再经过明代中前期的发展,到明末清初进入成熟期。另外,解以注为基础,注杜诗很难,宋人尽力于注,当宋人注已经注出十之七八,除非像钱谦益、朱鹤龄这样有能力别开生面的注家,元以后部分人不得不转向诗解体。赵(汧)、虞(集)注是第一阶段,明末以前有几种诗解著作都在序言或正文中提到赵、虞注,表明了它们的影响力,如作为本文研究起点的颜廷榘《杜律意笺》也还提到它们。唐汝